

金山高氏家族与前南社时代

邱 睿 罗时进^{*}

〔摘 要〕 高氏家族内部的思想调整,典型地体现出在清末激荡的时代风潮下,江南文化家族对历史变革的积极呼应。时局的巨变,科举的中断,使得世族门第无法按照原有的科举仕进的道路发展,而寄托于新的文化理想。高氏子弟在清末的戊戌维新风潮中曾经抱有某种改良愿望,然而随着时代风潮他们逐渐汇聚到反清革命洪流中。他们以家族的组织形态编辑了《觉民》月刊,并且以此为桥梁建立起与沪上反清群体的关联。该家族还创立了寒隐社,开南社文人革命之先声。在家族与社团关系研究中,高氏家族在清末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样本。

〔关键词〕 金山高氏家族;前南社时代;南社;寒隐社;《觉民》月刊

南社是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在清末以反清为职志,以诗文倡导革命。南社中有不少文化家族,如吴江柳氏家族、金山高氏家族、杭郡丁氏家族等,然家族与南社之关系至今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所关注的金山高氏家族在南社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个家族中包括女眷在内共有 10 名南社成员:高燮、高旭、高增、高圭、高杏、姚光、王槃君、顾葆瑛、何亚希、林棠^①。其中高旭为南社的发起人之一,姚光曾经在南社后期董理社务,高燮曾被视为南社的精神领袖。在近代文化家族如云的江南地区,高氏家族为何能特立挺出,以一种家族的形态与南社产生密切关联?在家族与社团关系研究中,高氏家族在清末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样本。如果我们将南社正式成立前称为“前南社时代”,那么高氏家族内部的思想调整,典型地体现出在清末激荡的时代风潮下,江南文化家族对历史变革的积极呼应。这一家族对南社成立的重要推动作用,也由此体现。

一、高氏家族反清思想的酝酿

清雍正四年(1726)金山县设立,隶属江苏省松江府。该地东接奉贤,南濒杭州湾,西邻平湖、嘉善,

^{*} 邱睿,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国际学院讲师,400715;罗时进,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南社诗人群体研究”(12FZW04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环太湖地区文学社团与文化生态研究”(10BZW056)阶段性成果。

^① 高燮为高旭从父,高增为高旭的弟弟,高圭为高旭从弟,高杏为高旭从妹,姚光为高燮外甥,王槃君为姚光之妻,顾葆瑛为高燮之妻,何亚希为高旭之妻,林棠为高杏之夫。

北靠青浦,交通便捷,而文化家族世代传承,人文蔚兴,英才辈出。金山高氏是当地望族之一,诗书与经济俱为可观。在清末延续了传统的家塾教育形式,学员为家族子弟,塾师也多为族中或地方硕儒,这使得高氏得以始终保存着文化家族自相师友的家风,在家族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群落。

在家族成员中,高燮(1878—1958)和高旭(1877—1925)按行辈为叔侄,事实上作为叔叔的高燮比高旭还要小一岁,相近的年龄让他们有相似的求学经历。他们的开蒙师叫俞贞甫,是金山当地人,这是一个以德闻名的儒者,曾举孝廉方正。

他们的第二位老师叫顾莲芳,高燮等对这位老师稍不以为意,认为他“好吟咏而闻见太隘,不足以助其思致”^①。当时十四五岁的高燮、高旭对老师的诗作常常“私相非笑之”,对于开始阅读诗界革命派诗歌的高氏叔侄而言,老师那些执着于日常应酬和传统咏物抒情的作品,显然难以感受到新的境界和气息。

第三位老师叫庄瘦岑,他是一个忧愤国事的儒者,诗歌中多有伤时之句,在甲午海战后,“尝效白香山体,为《何处难忘酒》十首,至为沉痛,不可磨灭之作也”;义和团变乱时有《纪变百咏》,“隐寓滑稽伤友情,空怀抑郁哭灵均”(第26页)。这位塾师在庚子之乱中死于北京,境况甚惨。当时远在上海的学生们闻知这个消息,震动很大。老师之死在高氏子弟心中激起的是让民族主义种子迅速发芽的力量。

除了沿习家学,高氏家族的联姻也延续了文化家族之间通婚的传统方式。高燮娶妻顾氏,顾氏也为江南著名的文化家族。高燮妻祖顾夔,字卿裳,号荃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道光六年进士,有《城北草堂存稿》,被长洲王惕甫称为泖东七子之冠。其妻王清霞著《小瑯环室诗余》,为闺秀诗人,传入《小檀栾室闺秀词钞》。顾夔子顾莲,字贞献,进士,著有《素心簪诗文集》。顾莲之女名顾宝璐,适高燮。顾宝

璐受家族熏陶也擅填词,高燮称“余内子幼芙亦略能为词,未始非渊源之留遗于无形也。”高燮对自己的妻族颇为敬慕:“顾贞献先生,道德文章为郡人士所宗仰,黄渊甫师及顾泰云先生尝受业焉。先人顾荃士,当清嘉道之际,以诗雄峰泖间。”(第26页)

和顾氏联姻,既带来了高氏家族文化影响力的巩固,也扩大了家族的交游网络,顾氏家族成员成为了其新的交游对象。如高燮交游的顾泰云先生,是高燮岳父顾贞献的弟子,是老师黄渊甫的同学,也是老师顾莲芳的宗叔,又与高燮哥哥高煌为姻娅,所以顾泰云常常到高家做客。这位从科举时代过来的文人非常擅长应酬诗作,“平生诗甚多,其应酬之作,尤清圆周至。”高燮诗作便时常得到他的指点。

从文化家族的发展脉络而言,高氏家族正按照传统前行,高氏子弟的就学、交游、联姻都具有传统文化家族的特点。如果按照这个方向,高氏家族应该在自己的文化轨道上继续科举和艺文的发展,以科第和诗文书画光大门第。对于大部分江南文化家族而言,此时仍在延续这样的传统之路,家风不堕,家学未改。但是高氏家族的标本意义就在于,这个传统的家族最早发生了文化践行道路的转变。1894年,高煌(1868—1943)应江南乡试中举,他是高燮的哥哥,大高燮十岁。也在这一年,高燮等私塾弟子们“厌恶八股文,愤慨之下取书塾内八股角艺之书而焚之,塾师大骇。为文不就法度,视举世之学无足当意”(第870页)。当高煌与高燮兄弟以决然不同的态度对待科举时,这个文化家族内部的价值体系正在分裂。高燮等人背弃科举,意味着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已然否认了传统的文化家族延续方式,高煌的中举恰如文化家族发展轨道的惯性使然,此后便无后劲。

1894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甲午海战对国人尤其是青年的震撼极大,青年皆思奋进有为。高燮曾这样回忆他的读书时代:“忆乙未丙申之

^①高燮:《感旧漫录》,高钰等编:《高燮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页。按:以下凡引此集,均随文括注页码。

际,余年十八九,读于家塾。时同学四五人,类皆志气奋发,不可一世。”(第26页)当时的同学除了高燮、高旭,还有顾镜渊、张仲传、何卧风、冯镜清。顾镜渊为塾师顾莲芳的弟弟、何卧风是高燮的伯氏姊子,冯镜清是何卧风的妻兄,也是高燮的中表戚。这些学友之间存在多多少少的姻亲关系。这个依托文化家族关系建立的文化群体中,正在暗中酝酿着对既有家族传统的反叛。

然而,相对于日后高氏叔侄创建南社时的革命理想,此时的反叛仅是家族少年对于时局的一种青春叛逆。当家族后劲的反叛还未发展为政治思想时,其表现方式便主要呈现于诗歌,高氏子弟以不断否认昨日之诗来探寻一种对于时局的呼应。在家塾求学期间,与高氏叔侄关系最契者为顾镜渊。这三人都喜欢作诗,高燮《漱铁和尚遗诗序》曾述及顾镜渊诗歌的演进脉络:

岁戊戌,志士奋起,争言变法,而东亚老大之睡狮,似有昂头欲醒之势,而君之抑郁因以稍释。乃不数月,而又科头睡矣,方且酣梦焉,又加甚焉,呼不醒焉。而君睹此现象,于是大愤,而其诗亦遂一变;庚子四月后,盲风狂煽,妖云渐兴,星火燎原,养痍斯溃。君丁此时,热血填胸,奇泪盈把,灵根忽现,骚鬼入肠,而其诗遂又一变;辛丑以后,清政府鉴兹大祸,迫于列强,重行一二新政,以饰汉民之耳目,则便有一般所谓开新之士者,相与延颈企踵,呼号而欢迎之,以为此中国之福也。噫嘻,悲乎,其果然耶,否耶?于斯时而君之诗又一变。(第44页)

在社会变局面前,诗歌已然无法沿着家族前人温柔敦厚的道路前行,对于这些追求“以我为诗、不以诗缚我”的少年来说,社会的变局就是他们最佳的诗料。从戊戌革新的渺茫希望,到庚子义和团事件的愚盲蒙昧,再到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这些事件激起的是家族子弟诗作的一变再变。“自近八年中,适当19世纪末以至20世纪初,其文字界变迁之速,率至于不可思

议”(第44页)。而这一变再变的诗歌,是这些青年对于近世事件的思考和回应,是从戊戌变法以来对清廷的一线希望到后来志在反清的心路历程。

遗憾的是顾镜渊未及“建其最高之宗旨,以运动一世”,便在1902年去世了。这一年顾镜渊、高燮、高旭三人有过最后一次也是有记载的唯一一次诗歌唱和。因为这三个人虽然交好,但是在创作上却强调各写胸臆,所以很少有同咏一物或是叠韵的作品,即“所志不尚苟同,是以同咏一物、同叠一韵者,集中甚鲜”(第44页)。所以1902年的这次唱和在三人的诗歌交往中就非常难得。这次唱和的内容是题咏梅花,诗歌中反叛精神还缺乏聚焦,显得较为隐晦。在顾氏去世两年之后,即1904年,高氏叔侄再次依韵写作了咏梅诗,以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仅仅时隔两年,高氏叔侄的作品便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风貌,诗歌中的反叛意识已然成为一种确切的反清态度,现将高氏叔侄同为“咏梅”题材的1902和1904年前后诗作并观:

高燮1902年的作品:“瘦腰独立兀不舞,空山黯淡雪复雨。天荒地老绝无语,别有深情郁万古。我将梅花比仁人,香风扶植天下春。可知貌冷常心热,不是凡身乃佛身。黄昏仿佛若有遇,梦与花神乞佳句。忽然挺出千万枝,争先未减少年气。”(第445页)

高燮1904年的作品:“矫然独立傲不舞,肯受悲风与美雨。托报亡国向谁语,长抱芳心追上古。古心古貌真奇人,凭君开出中华春。纷纷蛮雪压力猛,君乎依旧自由身。君今虽非好遭遇,评君大半激烈句。岂知光复之先声,即是天地之正气。”(第445页)

高燮1902年的诗歌中充满了少年争先之气,梅花在其笔下幻化为兀立不群的形象,但是其中的政治话语是含蓄的。1904年的作品则非常明显地赋予了反清的主题,当诗句中出现“光复之先声”这样的表达时,诗歌已经褪去咏物抒情的外衣,更近乎革命的宣言。同样,在高旭的作品中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由隐晦到明显的政治话语发展。

高旭 1902 的作品：“峥嵘枝干矫欲舞，侠骨稜稜战风雨。老梅尔非近代物，种自何年或盘古。抱负不作第二人，万花顶上占阳春。东风一夜热力涨，花花现出千百身。兰得称王好遭遇，为梅写生少奇句。虬髯骨骼石勒胸，基督灵魂项王气。”^①

高旭 1904 的作品：“我见梅花且拜舞，为表同情泪如雨。遍地腥膻欲谁语，忍令此花荒千古。蛮天萧瑟阒无人，仗尔光复汉土春。兀坐空山聊默默，冰霜难撼独立身。生来贵种纵无遇，不借东风弄章句。劲枝铁干横高崖，凜然饶有杀胡气。”^②

在高旭 1904 年的咏梅诗歌中也出现了指代清朝统治者的“腥膻”一词，以及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杀胡”、“光复汉土”等词汇。1904 年的高氏叔侄的作品比起 1902 年锋芒未露的诗歌来，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短短两年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巨大变化，1903 年《苏报》案发生；1904 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科举考试改八股为策论，科举已废除在即。清廷在文化上的压制以及强弩之末的革新，更加速了有气节的文化家族与之决裂的速度。如果说高氏叔侄在 1902 年的思想还有些许维新派的影子，两年后他们的思想已经蜕变为革命派。

值得一提的是高燮的外甥姚光（1891—1945），在 1905 年作有《咏梅，步顾灵石先生原韵》。写作此诗时，他 15 岁，中规中矩的诗歌创作显示出初学作诗的少年情态，然从诗歌内容来看，则显然受到家族的影响。姚光来自金山与高氏联姻的姚氏家族，姚氏家族“自明以来，世以德业文章显”；“自入清朝，而听岩公姚宏绪辑姚氏一家诗文，至百卷之多。辑《松风余韵》，录有明先德亦几二十人。说者谓云间之姚，几等江左诸王，人人有集，又若宋代之三刘家集，明代之长洲文氏五家诗”^③。这个兴起于明代的家族，既有文化的传统，更有气节的楷模，当年

加入几社的姚氏成员也复不少。来自于这样一个家族，姚光的民族主义思想本有其家族渊源，而咏梅诗在清末的背景下是家族反清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姚光选择以和韵咏梅作为加入到家族反清行列中的一个标志。诗句写道“只今春去无消息，此花乃似遗民身”；“神州满地尽胡尘，独有此花存正气”^④。其中“胡尘”、“遗民”的字眼使得姚光的诗歌初具革命派诗歌的面貌，这个行辈较晚的少年没有经历高燮等所受的维新派的影响，而直接受到社会和家族的民族主义精神洗礼，渐而成为家族中反清力量的后劲。

对于高氏家族而言，他们在清末点滴酝酿起来的反清思想，反映在一系列家族文化事件中，与科举的决裂使得家族成员需要思考新的文化承续之路，家族的诗歌活动则在不断的新变中成为家族文化步伐调整的外化形式。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渐渐凸显了反清的意志，而这个家族更具有时代意义的反清方式，便是编辑杂志《觉民》。

二、汇聚高氏家族思想的《觉民》杂志

《觉民》杂志为清季的革命杂志之一种，宣传反清攘夷，创立于 1903 年 11 月，停刊于 1904 年 8 月，共出 10 期。这份杂志可以算作高氏家族的家族刊物，其主要的编撰者为高燮、高旭、高增（1881—1943），高增为高旭之弟。这份杂志既是出于高氏家族的创办经营，其主要撰稿者也是高氏成员，很能反映高氏家族的反清思想形成的理路，更可以看出高氏家族是怎样通过办刊汇聚思想，加入到沪上的反满风潮中的。

日益高涨的反清洪流为文化家族带来新的时代命题，他们该如何以家族的面目从事反清活动？当清末各种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撼动王

^①高旭：《咏梅步顾灵石先生原韵》，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6 页。

^②高旭：《三和灵石先生》，《高旭集》，第 17 页。

^③姚光：《姚氏遗书志序》，姚昆群等编：《姚光全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0 页。

^④姚光：《咏梅，步顾灵石先生原韵》，《姚光全集》，第 176 页。

朝统治的时候,文化家族成员投笔从戎的个案也时有发生。暴力手段切合了激进的反清愿望,但是对于一个文化家族而言,此举却非其所长。文化家族的百年积淀在其艺文,家族子弟以诗文获誉,其鼓吹变革如就此入手颇易收事半功倍之效。高氏家族经过酝酿很快找到了一个文化活动与革命行为的结合点,那就是办杂志。这种文化家族的行为策略是其对于自身时代使命反思的结果,这在高燮与《政艺通报》主编邓实的通信中有所反映。

邓实致书高燮,提出救国策略应重在实力的观点:“盖今日救国存种之策,舍民族主义竟无从下手,惟此乃有一线生机。顾仆之私心,则以为在有实力而不在空言。”^①高燮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鄙人尝谓欲运动上等社会,在办报,欲运动下等社会,在演说。办报与演说,一则达之以笔,一则达之以口,要之皆空言也,然若能民智因之日开,社会精神因之勃发,则我中国但须有少数之实行家奋起于前,得多数之文字家、议论家为之赞成于后,便事半功倍矣。夫如是,则今日之空言即为将来实事之所倚,其力莫大焉。故文字之力亦力也,议论之力亦力也,岂必以腕力而始为力哉。”^②

在以上对话中,邓、高二人对于社会变革的方向没有分歧,但是在变革的具体途径上的侧重不同,彼时邓氏“西学为用”的观点尚存,故他希望以学习西方培养出中国的“实力”来。但是高燮却为实行家所谓的“空言”正名,他推崇文字之力,认为正当社会变革之时,文字家、议论家能以舆论发动民众,故强调语言文字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文人之文,并非空言,是具备掀动革命风潮之力的。这正是其创办《觉民》的缘由,以报刊开启民智,为社会变革做思想准备。

《觉民》创刊的1903年,江南地区正经历了《苏报》案。震惊江南的《苏报》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江南反清力量的一次整合机会,清廷的

高压反而令持反清态度的文人声气渐通,并且在后续的办报活动中互通往来。高氏家族成员在《苏报》案后反清意志更坚,高旭曾作诗声援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蚩尤幻作雾,天地谁肃清?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保皇正龙头,顿使吃一惊。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③令章太炎系狱的“罪文”,在高旭眼中却是令天地肃清的堂堂正音,这表明此时的高旭已经与当时章太炎倡导的民族主义达成了一致。

高氏家族以创办《觉民》参与到《苏报》案后江南地区高涨的反清活动中,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家族内部的反清思想酝酿,而与江南逐渐兴起的反清群体汇合,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他们与当时正处于酝酿期的国粹派的交往。国粹派的形成以1905年国学保存会的成立为标志,而1903、1904年间正是这个群体从具有维新派倾向的《政艺通报》群体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国粹学报》群体过渡的时期。

后来成为了国粹派领导者的邓实与高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交往颇密。高燮曾在顾镜清死后发出“吾道甚孤”的感叹,这一时期他在诗歌中称邓实为契友,可见高氏与国粹派诸子观念的融会:“文字有功争宪法,江湖求友契心知”;“诗界榛芜不可论,里哇嘈杂听殊喧。而今大雅无遗响,端赖男儿返国魂”(第447页)。诗歌既有对于“文字”之功的认可,也有对于一改诗界靡芜的期许。邓实曾在1904年前后编辑有《黄血丛书》,该丛书以激发种性为旨归,高旭对此有着很高评价:“吾道艰难一发存,犬羊未许枉称尊。收罗黄血三千斛,手浴平民未死魂。”^④诗中将“驱逐犬羊”的反清大义称为“吾道”,且赞赏邓实能将大汉族的历史搜罗全备,能激励民众的抗清斗志。

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共同经营一份杂志,就是为了共同坚守一种信念,以家族文化为资源,在大变动的时代为启迪民智发挥特殊作用。在

①邓秋枚:《邓秋枚书》,高铭等整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②高燮:《答邓秋枚书》,高铭等整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第215页。

③高旭:《题章太炎近著》,《高旭集》,第33页。

④高旭:《邓秋枚君近有〈黄血丛书〉之辑,诗以促之》,《高旭集》,第360页。

这个文化阵地上,诗歌仍然是他们的利器。

1904年4月8日的《觉民》第七期,发表了一首题为《寓庐与汉剑大雄联句限顺次完庚韵》的长诗,这首诗是由高燮(黄天)、高旭(汉剑)、高增(大雄)以联句形式共同完成的,它清楚地记录了这一时期高氏家族内部的反清思想的交流、激荡。全诗一开始便是以愤懑无端的情绪发声:“出门仰天呼长庚(黄天),汉家江山经几更(汉剑)。哀我同胞俎上羹(大雄),安坐惯食江南杭(黄天)。”诗句描绘出一个汉家江山几经劫难,同胞正任人宰割的场景后,高氏联唱者进入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读刺客传倾巨觥(汉剑),雄心未许胡运亨(汉剑)。族种主义调龙笙(汉剑),碎铁头颅供牺牲(大雄)。满耳赵瑟杂秦筝(汉剑),腥秽遍地谁肃清(大雄)。华夷杂处异感情(黄天),漫天淫雨天不晴(汉剑)。”在视夷族为犬羊的情绪宣泄之后,高氏联唱者进一步展开与日本近世以来历史的比较与反思:“弹丸岛国何坚贞(黄天),三十年来霸业成(汉剑)。人人胸中斗血盛(大雄),为国尽力作干城(黄天)。返观我邦谁竭诚(汉剑),群蚁附膻丑态呈(大雄)。”接着诗人环视国内外时局,表达出对铁血暗杀行为的推崇:“虚无党起驰莘莘(黄天),手弯霹雳弹狐麋(汉剑)。潜行暗杀伏麒麟(汉剑),激成反动力实勋(大雄)。”全诗最后呼应开头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出了更加激烈直白的表达:“虏廷仇视打一泓(汉剑),神州血海流涘涘(大雄)。长林丰草野豕宏(黄天),低垂豚尾毛披鬃(汉剑)。吾党勉旃志操轻(大雄),光复旧物宁无请(黄天)。”^①

高氏族人联句共唱,且完整地刊载于家族杂志上,这在清末的江南,乃至更大的地域范围,都是极为突出的文学、文化现象,值得近代文学史大书一笔。这首联句诗可以深度反映高氏家族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是他们创办《觉民》杂志意图的最好注脚。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研究南社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江南文化家族在组织大型的反清团体之前,是如何以家族

组织形式建立起反清活动的“宣传部”的。《觉民》杂志停刊五年之后,这个“宣传部”汇入到南社这个更大的反清力量中,是在新的文化理想和革命激情基础上,对时代的积极顺应。

三、以寒隐社为南社之先声

高氏家族最具影响力的活动,无疑是参与创立近代最大的文人社团——南社。对于南社的创社渊源,高燮在1917年给社友周芷畦的信中这样写道:“寒隐社之约,实为南社之先声。”(第401页)1940年,时隔多年以后,高燮仍然这样描述寒隐社与南社的关系:“南社之创,在清季庚戌,其时不佞先有寒隐社之结,而南社遂以继起。”(第437页)在高燮的叙说思路里,显然是以“寒隐社”作为南社导夫先路者,这与柳亚子将“神交社”视为南社的先声颇有不同。

寒隐社于1908年由高燮创设于故乡金山,这是一个以高氏家族成员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地方性文人社团。寒隐社编辑了一套《寒隐社丛书》,从中可以窥见这个社团的旨归。丛书共两种,一是陈子龙的《安雅堂稿》,一是吴日千的《吴日千先生集》。“己酉秋,余与同志数人结寒隐社,论学之余,更征集前人遗著之为世罕见者,谋次第刊行。”(第50页)丛书之于南社的意义在于,某种程度上参与并完成了前南社时代南社精神谱系的建立。

清末南社在酝酿建立过程中,需要从历史中为反清革命寻找精神支撑。于是一方面在诗文中不断回忆和强化明末的几复风流和遗民节操;另一方面便是整理几社复社和明遗民的文献。寒隐社的丛书整理工作便属后者。姚光曾这样描述寒隐社的时代使命:“余生不辰,当神州板荡之年,抱种族沉沦之痛,与吹万舅氏结为‘寒隐社’,将谓长作遗民以歿世矣。然如鲠在喉,欲有所言,以申大义于天下。而言之触忌讳,则无能传世而行远;国人之喜新又不若笃古

^①高铨等整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第145页。

之深也,乃校刊明季遗书而表彰之,使人心涵濡乎风教,而不忘其典型,以为提倡光复之一助。”^①姚光所言,既申明了寒隐社旨在光复的政治理想,也言明其文化手段乃在表彰文献,这正是前南社时代革命文人的共同努力方向。

南社骨干成员在南社成立前大多都曾致力于文献的整理工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互通有无,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群体共建南社精神谱系的过程。当高燮整理陈子龙集的时候,陈去病正在整理夏完淳的集子:“百年而公《安雅堂稿》亦以出世,而吾友吴江陈君去病、华亭张君孔瑛,近亦辑有《夏考功集》,欲谋付印之举。”(第46页)在编辑遗民著述的过程中,蔡哲夫也和高燮有所交流:“去年秋,得交广州蔡子哲夫。广州故昔羊城也,而蔡子知余喜表彰先哲,乃出其手抄邑明遗民《薛剑公先生集》,诗为《南枝堂稿》,文为《蒯侯馆草》,都数百篇寄余,请为序。”(第49页)此时,姚光也在整理《王席门先生杂记》,他邀请高燮为书作序:“吾甥姚子凤石,以书一卷题曰《王席门先生杂记》,谓抄于里中范氏所藏旧刊本,世无有存者,谋将梓行,而请为序之。”(第46页)

在发掘整理文献的过程中,对象的选择体现了鲜明的倾向性,上述陈子龙、夏完淳、吴日千、王席门、薛剑公都是著名的明遗民。其中除了薛剑公是广州人外,其余四人都是松江人,可以说是高氏的郡邑先辈。金山一带古称云间,陈子龙等既开创了文学性的云间派,又组织了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几社。这个群体符合作为南社精神楷模的标准:以文学的旗帜树立政治之影响。当这个精神谱系建立起来后,南社的面貌也就渐渐清晰。故而高燮在回忆南社与寒隐社关系时,称寒隐社为“南社之先声”。

在这个为南社成立寻求精神源泉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家族的力量。姚光是高燮寒隐社丛书编辑的重要襄助者。相对于《觉民》

时代,这一时期他已经成为家族中与高燮在文化活动中关系最密切的人,他参与了高燮《寒隐社丛书》的全部编辑工作。在《安雅堂稿》编辑中,姚光担任了校勘的工作,“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印成,予任校勘之役”^②。《吴日千先生集》也是由姚光将搜寻所得的遗民材料交给高燮刊刻的,“我友汪子若望,以其所藏抄本《吴日千先生集》见借,余以呈之舅氏高吹万先生删定,列之《寒隐社丛书》刊焉”^③。在《吴日千先生集》编辑完成后,由高旭为之作序,他阐明了家族力图通过文献整理工作宣扬民族主义的努力:“士君子苟稍具志节,未有不明种类之界说者。我邑吴日千先生,丁季世,目睹亡国惨状,其抑郁沉痛何可言喻。宁老死空山,不作新朝赞助,盖亦当时有志之士矣。”^④高旭概括了家族成员此时的文化态度,他们倡导了一种以整理文献来进行反清宣传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高燮创立寒隐社,他的反清行为隐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寒隐”外衣之下,就像他所推崇的明遗民那样,虽然以退为进地保持着气节操守,但也免不了有着与世疏离的狷介。所以需要弄清这一段若寒若隐的避世疏狂,到底是文人有意为之的末世自保,还是高氏家族成员的一种真实的文化态度?且看高燮的《寒隐社小启》:

春风无主,觉逃者之自愉;秋雨索居,悟浮生之靡乐。因思约素心而数晨夕,结胜侣以赏芬馨。南山当窗,望古而叹;西风满野,吾道其孤。倘有守雌癖士,抱拙迂腐,甘落寞于穷乡,课微茫于暗室。拟评松菊,呼五柳以相随;同理弦歌,招两生而偕隐。果能遁世无闷,盍与把臂入林乎。是故摅怀旧之蓄念,聊当加餐;发潜德之幽光,不求闻达。(第45页)

高燮的叙说有一种乱世中独善其身的意味,独寤寐言、湛然自守、秋雨索居,透露出一种吾道

^①姚光:《寒隐社丛书后序》,《姚光全集》,第46页。

^②姚光:《书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后》,《姚光全集》,第25页。

^③姚光:《吴日千先生集序》,《姚光全集》,第38页。

^④高旭:《吴日千先生集序》,《高旭集》,第510页。

甚孤的情绪。高燮在顾镜清死后曾经发出过知己零落的感叹,几年来他希望能各种交游中寻找相合的同道,但是和积极四处奔走拓展自己交游圈的侄子高旭不同,高燮始终倾向于固守自己的乡邑甚或是家族的范畴,包括后来创立国学商兑会,也一直固守着“独抱孤怀,不随时尚”(第427页)之旨。

高燮还用《拟结寒隐社作诗述意》来表达了自己在《寒隐社小启》中的那种心态:“说着论诗道已微,相思绵渺古人稀。风飘坠叶甘侵帽,尘起污人欲浣衣。林密山深心独往,天回地转愿终违。鸣条解与梧桐语,为报今年秋更非。”(第486页)在“为报今年秋更非”的诗句里,我们读到在寒隐社创立前一年,1907年秋瑾就义对当时江南士人的心态影响,这个事件让高燮内心对清末时局生出更深的失望,所以在“天回地转”的愿望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便倾向于一种独善其身的道德标举。

在家族中受到高燮影响最大的当属外甥姚光,在姚光的成长过程中,高燮一直扮演着导师的角色。高燮和姚光的关系是文化家族中特有的“舅甥关系”^①。从《觉民》到寒隐社,姚光都是高燮的积极追随者。姚光受到高燮影响的不仅仅是学识、思想,还有心态,他在十三岁时写出意气洋洋的反清诗文,被目为“童子军之铮铮者”,而寒隐社时代的心态却近乎逸民。姚光的一篇自传描写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心态转换:“年少气豪,有仗剑中原,策马塞外之志,以光祖宗之玄鉴,振汉族之天声自许。尝欲环游世界,尽览天下之名山大川而后快;负笈出游,即病几殆,一若天有以阻之者,平生志气,因而大挫。又亲老无兄弟,势不能远离,伏处里庐不复出,从寒隐先生游,偕隐焉。乃仰以追思千载之前,以狂牖文献为职志。”^②姚光在文化态度上受到高燮的影响很大,在此后很长时间,姚光都抱定和高燮一样的孤洁信念,投入到国粹的整理工作中。

对于高燮而言,寒隐心态让他在对待南社的态度上保持一定距离。他虽然投身于反清事业,参与了前南社时代的精神谱系营建,但是这个对于精神节操有着孤高标准的人,其时倾向于二三素心人之间共同砥砺节操,他排斥那种规模巨大、人声喧阗的社团组织。而柳亚子这时正在酝酿组织以文字鼓动风潮的革命队伍,他积极地邀约全国各地持有反清思想的文人加入其中。故而高燮在回忆中曾这样说:“其实不佞轻轻之见,与南社之广滥,本稍有不同。自入民国,佐命者颇多社中之人,从此入社者乃更滥于前。”(第437页)高燮不满于南社的“广滥”,他的理想本不在一种声势煊赫的活动。和《觉民》时代的词锋激烈相比,此时他倾向于一种逸民心态,不是站在文字革命的前线,而是选择用文献整理的方式来为反清攘夷的活动赢得正当性,他认为国粹的整理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更具价值。这是文化家族在经历革命风潮时常常坚守的文化信念。高燮心态的转变,代表了当时的一批士人,他们以学术的方式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这以日渐兴起的国粹派为代表。他们赞同革命,但是又很容易在激进的革命面前退回到熟悉的文化环境中,经营他们认为与国家命运相系的学术事业。不论是高氏家族在寒隐社之后创立国学商兑会,还是国粹派在《国粹学报》终刊后创立《古学汇刊》,未始不是因其文化态度早已注定。

高氏家族在前南社时代的活动体现了文化家族在近代转换的理路。从私塾学友的诗歌革新,到创立《觉民》鼓动文字风潮,再到整理文献襄助反清革命,呈现出一个江南文化家族的自我价值调整轨迹。清末时局的巨变,使得文化家族无法按照原有的科举仕进道路发展,而必须寄托于新的文化理想。高氏家族的子弟在清末戊戌维新风潮之后,一方面激进,一方面持守,但无论是对思想的激进表达,还是对传统文

^①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按:该文指出“舅甥关系”也成为江南名族高门的一种具有丰富文学内涵的关系。它揭示出江南家族文学在父系血脉的作用外,还受到母系血脉的重要影响。

^②姚光:《赤松逸民传》,《姚光全集》,第30页。

化精神的持守,都出于其民族主义的立场。正是在这面旗帜下,他们最终汇聚到南社中,卷起滔天的革命巨澜。前南社时代高氏家族思想和实践,正可以成为近代江南文化家族真实的

人格精神与思想风采的标本。

(责任编辑:陆 林)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of Gao in Jinshan and the Age before *Nanshe*

QIU Rui, LUO Shi-jin

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in Gao's family in Jinsh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characterized how the big families of intelligentsia in the Jiangnan Region responded to tumultuous historical changes at that time.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especially the abolishment of *Keju* system, prevented people of those families from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way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hus forced them to turn to new cultural ideals. Members of Gao's family, who had embraced the idea of social reform in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led by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joined the force to topple the Qing Government. They started a family monthly journal of *Juemin* (literally awakening people) and established a connection with the forces against Qing Government in Shanghai through this magazine. In addition to the journal, Gao's family also set up Hanyin Association, blazing a trai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Nanshe Association. In this sense, the study of Gao's famil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famil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ey social communities.

Key words: family of Gao in Jinshan; era before *Nanshe* Association; *Nanshe* Association; *Hanyin* Association; *Juemin Monthly*